

元代版刻地图考录

黄 燕 生

元代历时不长，但地图绘制技术的进步却是划时代的。杰出的元代地理学家朱思本费时十年绘制成的《舆地图》，将我国传统的绘图技法推向一个新的里程，明代和清初制作的全国地图多以朱氏舆图为范本，明清一些地方舆图的绘制者也常称其画方技术源自朱思本。由于各种原因，朱思本的《舆地图》未得刊刻印行，而是勒石于上清之三华院，通过拓本形式流传，到了清初已罕见其踪，但我们仍可以从明罗洪先《广舆图》中窥见其丰采。此外，保存在元代政书、类书、方志、笔记中的版刻地图，展现了与《舆地图》同时代各类地图的原貌，也是认识元代地图学成就的珍贵资料。

元代的刻版地图虽未出现《舆地图》式的画方地图，但在制图方法、地图类型、地图的应用和流传等方面比之宋代地图有了新的进步。

首先，元人已注意到运用勘测成果为地图制作服务。元世祖忽必烈曾派人勘察河源，将实测结果绘成了地图，原图虽不可见，但摹本分别保存在明刻《三才图会》和《南村辍耕录》中。该图第一次将星宿海作为黄河上源标绘在地图上，对河源地区的水系分布，山脉座落以及城池、驿传、道路的位置作了清晰的描绘。元代中叶，朱思本根据从八里吉思家得到的帝师所藏梵文图书中

西域人关于黄河源于星宿海西南的卡日曲（与今人对河源的认识相同）的勘测成果，对《舆地图》中的有关记录做了修改。明刻《广舆图》和写本《杨子器跋舆地图》如实地再现了朱图关于河源的描绘。

其次，地图符号的运用更为广泛。宋代地图标示地名，多是不加区别地将地名圈以单线边框，而元图字框则按其规模或级别绘成的各式图案或几何图形；宋代版刻地图中表示山川、水泊、寺观、桥梁的地图符号，在元图中也得到普遍继承和改造，并且有统一化的趋向。朱思本能够创始图例，正是由于有当代人广泛运用几何符号标示地名地物的客观基础。

第三，元人将地图施用于生产实践中，从而为地图的应用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元代以前，地图往往只服务于统治者，宋代大量涌现的边图，也是出于军事上的目的。而元代贾鲁、王喜等人所绘治理黄河工程地图虽然也带有“呈进”色彩，但主要着眼于国计民生，直接效益于中原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李好文《长安志图》首创水利图，也表现了当时对治水的重视，并为地方志收列水利图开了先河。

第四，有案可查的中外制图技术的交流也始于元代。蒙古征服了欧亚大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十四世纪中叶，阿拉伯人莫斯陶菲·葛兹维尼绘制了只有地名的网格地图，同一样式的地图还出现在元代官修政书《经世大典》中。这种以定量制图为主要特征的蒙古式地图，与很早就盛行于中国的计里画方地图以及稍晚在西方出现的绘出经纬线的近代地图有着明显的共同点。对此，李约瑟博士认为：“欧洲在十四和十五世纪之所以能在制图学方面有所前进，不仅与阿拉伯人研究了托勒密的制图学有关，而且也与定量制图学或多或少从中国传到了西方有关（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除此之外，元代地理学家绘制的《声教广被图》和《混一疆理图》，在1399年被朝鲜人

金士衡带回国，这以后，中国传统地图在朝鲜和日本也有了影响。

元代版刻地图传世不多，除《事林广记》、《至正金陵新志》中尚有元刊本传世，其余皆为明清人再版，有的还带有后人改易的痕迹。现将所见到的七种载有元图的著作编录如下。

《洞霄图志六卷》

宋末元初人邓牧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为宋人著作，考邓牧入居洞霄宫是大德三年（1299）事，又卷首吴全节、沈多福二序分别作于至大三年（1310）和大德九年（1305），故是书当为元代作品。洞霄宫在今浙江省余杭县，道书所谓七十二福地之一。

《洞霄图志》分为宫观、山水、洞府、古迹、人物、碑记六门。卷首有《南宋余杭县境图》、《洞霄山图》、《洞霄宫图》、《洞霄宫新图》等四幅地图，每图系以图说。据图说云，《南宋余杭县境图》是邓牧据宋刻本《咸淳临安志》中的《余杭县境图》改绘而成的，笔者细校二图，知邓牧绘图比宋图稍加改进。如原图标示桥梁，或绘其图形，或标其名称，或于河道上绘出道路，而邓牧之图，一律用表示。《洞霄山图》、《洞霄宫图》取自闻人氏《洞霄宫志》（已佚），仅《洞霄宫新图》为新作，然过于简略，只半页。

据《增订四库简目标注》，该书有元刊本，鲍刊本，《知不足斋丛书》本和《笔记小说大观》本。元刊本今未详藏所，知不足斋本与《笔记小说大观》本无图，仅清鲍刊本有此四幅地图。

《事林广记》四十二卷

陈元靓编。为南宋末年成书的一部类书。是书元至顺刻本中补入《大元混一图》以及诸行省所辖图六幅，分别表示今华北、

华东、中南、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的地理形势。凡重要城市圈出双线，又以象形符号标示名山胜迹。诸图绘刻不精，尚有一些疑点值得深究。其一，《大元混一图》区划各地，标“道”而不称“行省”，与实际的行政区划不符，也很难同后面所列诸行省所辖图一致；其二，西夏国早在1127年就被蒙古灭掉，但在本书中，却分别出现在《大元混一图》和《陕西甘肃行省所辖图》上，令人莫名其妙。看来，元人在翻刻这部宋人著作时，虽用心良苦，添加上“大元皇帝奄有天下，混一南北……山河之固、都邑之盛、宫室之美、前古之未有。美哉！万世帝王子孙之基业也”一类歌功颂德的谀词，但所补之图，却是拙劣不堪，多是对旧图的摹绘和挖改，以致产生明显疏误。

《长安志图》三卷

李好文纂。李好文，字惟中，至治元年（1321）进士，官至光禄大夫，此书是他在至正四年（1344）出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时所作。长安有志，始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为宋敏求所撰，无图。七年后，吕大防完成《长安图记》一卷，被附刻于志后。迨及元代，志存图亡，李好文缘此而为新作。关于此书与《长安图记》的关系，一直未得澄清。朱彝尊《长安志图序》云：“宋敏求撰《长安志》，旧有图勒之碑，吕待制大防跋其尾，秦人取以附锓于志，谓之《长安故图》，其后亡之。元至正初，东明李好文官陕西行台侍御史，补绘二十有二，分为三卷。”以为地图纯系李氏补作。《四库总目》则云：“好文因其旧本，芟除伪驳，更为补订，又以汉之三辅及元奉元所属者附入，……”认为是参订旧图而成。清人周中孚在详细对校《图》、《志》之后指出：“志中亦引用吕大防所订（《长安图记》）。”（《郑堂读书记》）也赞同四库馆臣的说法。李好文究竟看到吕大防《长安图记》没有，当然以作者本人的说明为最有力的证据。在北京图

书馆收藏的明成化四年（1468）邵阳书堂刻本《长安志》及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录有元至正二年（1322）李好文自序（有残），其中有如下三段关键性记述：

图旧有碑刻，亦尝铍附《长安志》后，今皆亡之。

因求昔所见之图，久乃得之。于是取志所载宫室、池苑、城郭、市井曲折方向，皆可指识瞭然，千百世全盛之迹，如身履而目接也。

……《长安故图》，则是前志图故有之，其时距唐世未远，宜可据而足征也。然其中或有后人附益者，往往不与志合，因与同志较其讹驳，更为补订，厘为七图。又以汉之三辅及今奉元所治，古今沿革，废置不同，名胜古迹，不止乎是，泾渠之利，泽被千世，是皆不可遗者，悉附入之。总为图二十有二，名之曰《长安志图》。

观此可知，第一，所谓“今皆亡之”，指的是原来合刊在一起的《长安图记》由于志、图分离所造成的志存图亡。第二，李好文经过悉心搜求，确实找到故图，并加以校讹辨误，更为增补，重新附于志后。因此，朱彝尊所言李好文“补绘二十有二”，失于详察。

李好文自序及诸家著录皆称有二十二幅图，今本图目只有二十，又三图有目无图，实有地图十七幅，如果连计一图多幅（《唐骊山宫图》分上中下，《唐昭陵图》分上下），则有图二十幅。卷上是历代城市宫苑胜迹图，有《汉三辅图》、《奉元州县图》、《太华图》、《汉故长安城图》、《唐宫城坊市总图》（无图）、《唐禁苑图》、《唐大明宫图》、《唐宫图》、《唐皇城图》（无图）、《唐京城坊市图》（无图）、《唐城市制度图》、《奉元城图》、《城南名胜古迹图》、《唐骊山宫图》；卷中为古迹皇陵图，有《咸阳古迹图》、《唐昭陵图》、《唐建陵图》、《唐乾陵图》；卷下是两幅水利图，《泾渠总图》与《富平石川

溉田图》。《长安志图》虽还不是正规的方志地图，但毕竟是因志作图，所以，它成为地方志绘水利图的开端，受到后代方志学家的盛赞和效法，《四库总目》称赞此举“尤裨于民事”。是书列有图说多篇，或叙由来，或录题跋，也是观图者不可忽略之处，例如卷上所录吕大防题记及邛邦用跋语就对考定吕氏《长安图》（今存残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综览所列十七图，绘刻均较精良，采用地图符号也较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该书以凸表示碑刻，以△表示冢墓，这既是象形符号，也含有几何符号之意，而几何符号比象形符号更进一步，这些地图符号与《至正金陵新志》的一些标示符号也极为相似，反映了元人对地图符号的运用有了新的水平。

《至正金陵新志》十五卷

张铉纂。初刊于元至正四年（1344）。这是现存有关南京地区的第二种地方志。其体例仿周应合《景定建康志》，首为图考，次述通纪，又有表志谱传，终以摭遗论辨。内容则详今略古，深得历代志家称誉。书分十五卷，然三、四、五、六、十一、十二、十三皆再分子卷，通计子卷，实有三十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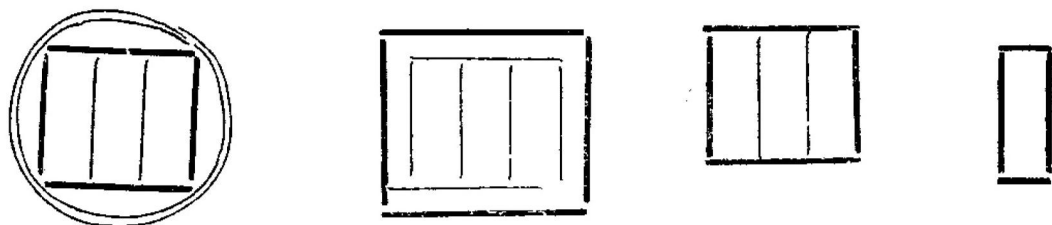
张铉十分推崇周应合《景定建康志》附图之例，他在《修志本末》中说：“古之学者，左图右书，况郡国輿地之书，非图何以审订？郡士戚光纂修续志，屏去旧例，并去其图，览者病焉。今志一依旧例，以山川城邑官署古迹次第为图，冠于卷首，而考其沿革大要，各附图左，以便观览。”

据北京图书馆藏元至正本考查，目录列图十八，实有二十，较之二者，略见不同：其一，排列有异。目录第五是《集庆路治图》，实列第七，原位易以《集庆□城之图》；目录第四幅《旧建康府城形势图》挪至第六位；目录列第六的《益都路万户府镇守地界图》改列第八，无“益都路”三字；目录中的《蒋山图》和

《茅山图》分列十五、十六，北图藏本则为十九、十八，二图次序相反。其二，名称改易。目录中《路学新图》易名为《集庆路学图》；《行台察院公署图》少“公署”二字。其三，互有增损。北图藏本无目录所列《曹南王祠堂图》，多出《集庆□城之图》（第五幅）、《重修贡院之图》（第十四幅）、《治城古迹图》（第十七幅）。该本内贴一页说明，指出有数图乃抄配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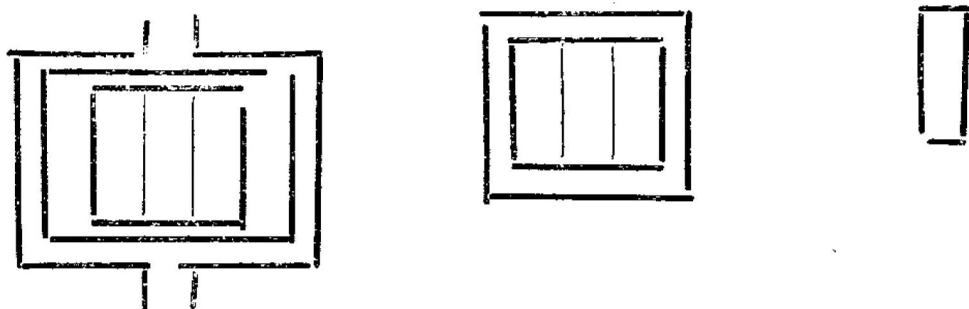
是书不仅收图较多，对地名的标示也很别致。如《南台按治三省十道图》以不同形状的边栏表示不同等级的城邑：

（一）标省、防 （二）标府、台、路 （三）标县



又如《金陵山川封域总图》：

（一）标州 （二）标县 （三）标乡



这种区别性的标示，远承马王堆汉代古地图余绪，近承宋《景定建康志》舆图的传统，可以说，是明清地方舆图广泛运用各式几何图形标示各类地名的先声。

是书所收其它地图也出现了一些别致的地图符号。如《集庆□城之图》以≡≡≡表示城墙的延伸，不同于传统的绘锯齿形的

标示，《台城古迹图》以○○○表示城门，这在中国古地图中也不多见。另外，《南台按治三省十道图》描绘湖泊、山川极为细致，尤其是将揭阳岭、天目山、龙虎山、麻姑山以象形符号绘成连绵一片，很有地形图的特色。

《至正金陵新志》传世有元至正刻本、明正德十五年(1520)补刻本，以及若干抄本，都不易见到。通行本为民国三十七年(1948)南京市通志馆铅印《南京文献》本，惜该本未收地图。

《治河图略》一卷

王喜撰。约成书于至正八年(1348)前后。是书“首列六图，图末各系以说，而附所为治河方略及历代决河总论二篇于后。(《四库总目》)”

元泰定、至顺、至正年间，黄河连年决堤，尤以至正四年(1344)正月河决汴梁、五月再决于白茅堤、金堤为重。当时水夺会通运河，妨碍了两漕盐场，影响到朝廷财计，被称为近古以来罕有之厄运。至正八年，诏立行都水监，广采众臣谋策。《治河图略》图后附说皆称“臣谨按”，其《今河之图》又于河道封邱一段注有“今决于白茅石，”据此，是书应是此时期的进呈本之一。

六幅地图是《禹河之图》、《汉河之图》、《宋河之图》、《今河之图》、《治河之图》、《河源之图》。绘刻较粗率，山川皆写实，地名加单线字框，一如宋例。前五幅地图均以上方为北，山峰取势及多数地名的标向则以上西下东为正。《禹河之图》黄河中游龙门一带，注有“上去星宿海六千七百余里”，“上去积石三千里”，已将河源归溯星宿海。后一幅《河源之图》，取势上南下北，与明刻《黄河源》图(详见下节)相同，地形的描绘和地名的标示也差异不多，如也将星宿海绘为葫芦状，并与二巨泽相连，星宿海中绘有表示泉潦的小圆圈。两图相校，《河源

之图》于贵德州增注“五日程到积石”，积石州增注“五日到安乡，”似是绘者据潘昂霄《河源记》补入。

是书早佚，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除库本外，传世还有墨海金壶（丛书）本及若干抄本。

《南村辍耕录》三十卷

陶宗仪纂。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元末明初人，一生读书甚众，曾辑录所见之书而成《说郛》，又将晚年居松江时随手所记汇编成这部笔记。

是书卷二十二“河源记”条收有《黄河源》图一幅，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河源图。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四月，都实、阔阔出兄弟奉诏勘察河源，于是年冬返回，“并图其城、传位置以闻”（《元史地理志》），延祐二年（1315），潘昂霄根据阔阔出的转述，撰写了《河源志》。《南村辍耕录》全录潘昂霄志文及元统元年（1333）柯九思序，所附地图虽未注明出处，但从图的内容皆合于志文记载看，当出自都实等人。

图取位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以双线绘波纹表示河道，虚线表示驿路，地名加单线边框，一如宋图传统。惟山脉绘实景，起伏绵延，很有特点。又，西宁州的字框呈十字形，异于其他府州，反映了元代地图以不同符号区别各级行政单位已很普遍。

此图绘河源于星宿海一带，星宿海呈葫芦状，东接阿剌脑儿、赤宾河。据潘昂霄《河源志》载：“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涣，方可七八十里，……旁履高山下视，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火敦，译言星宿也。群流奔凑，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脑儿；自西徂东，连属吞噬，广轮马行一日程，迤邐东鹜成川，号赤宾河”。可以看出，是图所绘河源，完全符合都实等人实地勘察的结果，表现了

元人对河源的新认识，改变了以往或循“导河积石”旧说，或止绘河源于昆仑山一带的模糊观念。明嘉靖万历间的几幅河源地图，如《广舆图》、《三才图会》中的《黄河图》、《图书编》中的《河源总图》、《黄河源流图》，都绘河源于星宿海，并模仿该地图，在星宿海中绘出许多小圆圈，表示泉潦。元《黄河源》图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反映都实等人实测结果的黄河源图，还见于明万历刻本《三才图会》地理类四卷，图分两幅，图的取位和地名地物的标绘与《南村辍耕录》所收地图基本相同，仅山峰改用传统的象形符号表示，大部分河水不绘波纹，个别地名的注释也有舛误。

《海国图志》五十卷

清魏源撰。约成书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为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一部书，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著作。是书刊载了一幅《元经世大典地里图》，据魏源称“得自《永乐大典》。”

《经世大典》是成书于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的一部官修政书，全书共八百八十卷，今已不传。明初编《永乐大典》收录此书。清代学者曾辑出若干篇章，散见于《国朝文类》（存序录）、《广仓学窘丛书》（存记六篇）、《海国图志》（存地理图）。另外，现存《永乐大典》残卷中也保存着若干条佚文。

《元经世大典地里图》与中国传统地图不同，其一，图上不绘地形地物，只标地名，地图上有纵横相错的直线组成的网格；其二，南北东西四个方向不是分排四边，而是置于图的四角。这类地图也被称为蒙古式地图。

关于这幅地图的来源和绘制年代，向有不同说法。魏源根据此图“西南不载印度，北不载岭北各地，”认为是“海都诸王及印度回国叛后之版图”（见图说）；洪钧则据《元史》载至顺年间西域诸王孛儿只吉等来朝贡，认为是此时进呈之图（见《元

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光绪间，沈曾植写有《经世大典西北地图书后》，亦称：“（是图）独详于回国故地笃来贴木儿、不赛因二人所封，其必为回回人所绘无疑也。”当时，蒙古民族统治着中国，又征服了中亚和欧洲，扫除了东西交通的人为障碍，这幅只绘西北地区的蒙古式地图经西域人之手传入中国是完全可能的。它也是元代中外地图交流和制图技术相互影响的一个明证。

这幅形式怪异的西北地理图标有几十个地名，其中若干地名及注文已是入明以后事，带有后人增改的痕迹。魏源收此地图入《海国图志》时，自言“去其三横画而加葱岭斜亘之画绕路其间，且增天竺、土伯特、于阗、沙州四名于东南，以醒阅者之目。”（见《海国图志》卷二）说明图中自南向北的斜线及于阗等四个地名是魏源增加的。另外，《永乐大典》收录前代地图，常妄加增删改易，如河南府所收的三十三幅图、梧州府所收的二十一幅图中空白字框很多，《元经世大典地里图》既曾出入《永乐大典》，也可能带有明人的修饰色彩。

《元经世大典地里图》仅见于《海国图志》初印本（1842年成书的五十卷本和1847年成书的六十卷本），1852年扩增为百卷本时，魏源删除了这幅图。

一九八六年七月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历史博物馆